

加拿大华人社会的历史变迁与现状

——兼析华人新移民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叶 静

华人移民加拿大始于 19 世纪中叶。早期华人移民为加拿大西部开发及太平洋铁路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加国政府却长期奉行种族歧视政策,先是用人头税后又颁布排华法令限制和禁止华人移民加拿大。二战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加拿大于 1947 年取消了排华法,但其后多年间,加国政府对包括华人在内的非白人移民入境仍加以种种限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加拿大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对高素质劳力的需求增加,而在此期间,加拿大本国技术人才外流十分严重;此外,欧洲经济繁荣和人口出生率下降也使来加移民人数逐年减少。这就促使加拿大于 1967 年修改其移民政策,删除其中的种

族歧视性条款,引进“评分制度”,面向全球招揽人才,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

新移民法的实施使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数量迅速增加,并逐步取代欧美成为加拿大海外移民的主要来源地。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加拿大移民政策的进一步调整,非欧洲移民比例更是大幅上升,2001-2006 年间共有 110 多万新移民来加,欧洲移民仅占 16.1%。亚裔加拿大华人数量增长最快,从 1951 年 3.3 万人增至 1971 年 11.9 万人。八十年代以后,华人数量更是猛增,至 2001 年时已超过百万,是加拿大最大的少数族裔群体。据 2006 年最新人口普查,加拿大现有华人 121.7 万,占全加总人口的 3.9%。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过去 20 年间,移居加国的华人数量持续增加,但新移民中“回流”现象也日趋严重,不少新移民来加一年后就选择回国。另外,近年来,加拿大华人中,尤其是来自大陆的新移民,因不堪生活重负接连发生自杀或猝死事件已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加拿大一些学术性研究机构,如位于新移民相对集中的安大略省(Ontario)以及加拿大西海岸的卑诗省(British Columbia)的移民问题研究中心,近年来对华人新移民进行了一系列的深入调查与研究。本文将借鉴上述研究机构以及其他诸多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对加拿大华人社会的历史变迁,尤其是二战后华人社区发生的新变化以及

3800 斛胡椒,在付款时发现了这批胡椒有毒,但他仍然按原价买了下来,这是因为他考虑到如果退回卖主,这批胡椒还可能转售他人,这样就会坑害更多的人。徽商的这种舍利取义的行为和诚信的品格为他们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和口碑。“亦儒亦商”的文化性格使他们更具有经商的智慧和把握商业机遇的能力,更容易结交官僚士大夫,扩大他们的社会交际圈,这也间接的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回报。

尽管徽商注重功利,追求钱财,但在实践中也深感文化的重要,加之传统文化对其根深蒂固的影响,当他们积累了大量财富之后,培养子孙读书做官就成了他们的追求。因此,重视教育,提倡读书在徽商中蔚然成风。为了让更多的子弟读书业儒,徽商大量投资兴办家塾、义学、书院,还为家庭贫困的宗族子弟提供经济援助。

正是徽商们的努力,才使得徽州地区成为“东南部署”、“文献之邦”,浓厚的读书氛围绵延数百年而不衰,培养了大批的人才,这些人是徽州文化培育的精英,同时他们自身也成为徽州文化的创造者和生力军。从这个意义上讲,徽商的重教兴学为徽州文化精英的成长提供了物质保证,也为徽州文化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徽商的文化投资显示了他们独特的眼光,他们的雄厚财力足以支撑文化的繁荣,满足自身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需要。反过来,这些文化上的投资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利益,戏班和园林有效地发挥了社会交际的作用,文人雅集、诗酒文会对徽商来说,其中就很有可能蕴藏着商机,蕴藏着他们所追求的财富。对子孙后代教育的重视,培养了更多的人才,形成商儒互济的局面。他们以一

己之力改变了文化史的走向,促进了商业与文化之间的良性循环。

没有文化的商业是短命的,没有商业的文化是无力的,文化和商业不应该是立立的而应该是共生共荣,相互促进的。徽商是经济与文化良性互动的一个标本,“我们研究徽商的历史,不是醉心于颂扬往夕的辉煌,而是希望从中寻求一种精神力量,以应对迅猛发展的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问题。”^②

参考文献

①胡适 著,唐德刚 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②潘小平,《徽商精神中的现代价值》,《江淮》,2004(1)

(作者:安徽大学中文系 09 级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责编:周蕾

华人新移民在社会文化融入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加以概述和探讨。

一、二战后移民潮——从港台移民到大陆移民

二战前移居加国的华人主要来自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由于加国长期排华,华人数量始终不多,1941年时仅有3.5万人,占加拿大总人口的0.3%。1947年加国虽废除了各种排华法案,但其后20年间,对华人移居加国仍有种种限制。例如,1947-1962年间,华人被限制在家庭团聚移民类别,规定只有入籍公民才可以申请担保其直系亲属来加。由于长期反华排华的结果,至四十年代,在加华人中仅有5%为加拿大或英国公民。1967年加拿大实施新移民法后,华人移民数量迅速增加。在1949年至九十年代中期入境的57万华人移民中,约92%是1967年以后来加的。1997年以前,从香港移居加国的华人远超过来自大陆和台湾的移民,然而1997年以后至今,大陆已取代香港成为加拿大华人移民的最大来源地。

就香港而言,六十年代以后出现过2次规模较大的移民潮。一次是在1967年至七十年代中期,共有6万多香港人移居加拿大,这与1967年香港政治骚乱以及同一年加拿大实施新移民法有关。另一次移民浪潮更大,从八十年代中期持续到九十年代中期,由多种因素造成。首先是1984年中英签署了1997年香港回归的联合声明,引起了港人的恐慌;次年,为吸引外资,加拿大扩大了商业移民计划,导致大批港台富商到加拿大投资;1980-2000年间,共计近80万华人移居加拿大,其中,港台移民过半(57.4%),他们中又以经济移民(即商业移民和技术移民)居多。例如,1990-1994年间加拿大共接受约12.4万商业移民,42%来自香港。1997年以后,港台移民人数逐年下减,至2001年时已不足2000人;与此同时,港台移民中“回流”现象也十分严重。这与近年来加拿大经济状况不佳,生意难做有关。另外,加国政府于1998年元月开始实施“境外资产披露法案”也是导致1997年后港台移民锐减的一个重要原因。

1970年中加建交前,大陆很少有人

移居加拿大。1973年两国签订了家庭团聚移民协定,从而使部分在大陆的加拿大华人亲属得以赴加。80年代改革开放,中国放宽了公民出国条件,此后移居海外者逐渐增多。90年代中期开始,加拿大扩大吸收高学历专业技术人才,简化对大陆经济移民的审批程序,从而导致大陆移民人数迅速增加。1980-2006年间约38万大陆人移居加国,其中,90%是九十年代以后去加的。不同于港台移民,大陆移民以家庭团聚移民和技术移民居多,商业移民较少。例如,1980-2000年间入境的22万大陆移民中,技术移民约占44%,而企业家及投资移民不到4%,家庭团聚和亲属担保移民则从八十年代93%降至九十年代39%。

二、加拿大华人社会的新变化

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加拿大华人社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1、人口结构的变化。由于加拿大早期劳动市场对男性劳力的需求,加之1885年至1947年间加国政府采用高额人头税及排华法令限制华人入境,华人社区男女比例严重失衡,人口迅速减少、老化。整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间,男性比例是女性的12-15倍,人口从1931年4.65万人锐减到1941年的3.46万人。二战后,加国政府废除了排华法,允许华人家庭团聚,并逐步放宽对华移民政策,致使华人社区男女比例失衡及人口老化问题逐步得到改善,至八十年代末,华人社区两性比例已达平衡。加拿大本土出生的华人数量也日益增多,2001年时土生华人为25.7万人,占加拿大华人总数的25%。就年龄结构而言,华人人口呈年轻化趋势。二战前来加的老移民日渐减少,至1991年时仅剩1.268人,占华人总数的0.2%;70年代以后来加的华人移民成为华人社会的主体。二战后来加的华人中有很多是家庭团聚移民,青少年所占比例较大。加拿大本土出生的华人年龄相对更年轻,1991年人口普查显示,土生华人中,30岁以下者高达83.8%,30岁至65岁占14.4%,而65岁以上者仅为1.8%。

2、来源地及居住模式的变化。二战前,加国华人主要来自广东四邑地区。战

后,尤其是1967年后,华人移民来源地呈多样性,来自世界各地。即使是大陆移民,也不再局限于广东地区,很多来自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如今在华人社区,除粤语外,还可以听到闽南话、客家话等方言以及普通话。由于九十年代后大陆移民的迅速增加,普通话已成为华人社区中除粤语外使用最多的语言。早期华人移民大多集中在加拿大西海岸的卑诗省。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东部安大略省取代卑诗省成为拥有华人最多的省份。如同老一代华人,二战后来加的华人移民多数选择在大城市生活和工作。例如,1980-2000年间,近80万华人移居加国,其中约95%选择在多伦多和温哥华这样的大都市定居,比同期来加的其他国家移民高出9个百分点。

由于白人种族歧视以及自身语言障碍,早期华人大都聚居在唐人街。二战后,随着主流社会对华人歧视的减少,一些中产阶层华人陆续从唐人街迁到环境较好的郊区居住;战后来加的新移民大多也避开老城区的唐人街,而去白人集中的郊区购房安家,故而华人社区逐步由市区向城郊扩展,新型华人商业大厦和购物中心拔地而起。传统华人组织如宗亲会、同乡会、中华会馆在战后日趋多元化的华人社会中已渐失影响力,新的华人社团,如专业人士协会、商会、校友会、中华文化中心等以及各类华人社区服务机构,如律师事务所、房地产及保险公司、银行、旅行社等纷纷涌现。此外,以维权为宗旨的华人政治团体也相继建立,如八十年代末成立的全加华人协进会,至1993年时已有30个分会。该组织曾于1979年成功地组织和领导了针对加拿大电视台W5频道无端指控华人学生在高校挤占加拿大学生位置的抗议活动以及1984年声势浩大的要求退赔人头税运动。

3、知识结构和职业的变化。早期华人移民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加之就业市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华人大都只能从事服务性行业,如杂货店、洗衣房和餐馆等。二战后,尤其是1967年实施新的移民政策以后,高学历的华人技术移民不断增加;同时,本土出生的华人受教育程度也逐步提高。据统计,2001年时,近1/3的加拿大华

人拥有大学学历,而加拿大总人口中这一比例仅为 18%。就华人移民内部几个主要群体的教育程度而言,九十年代以后来加的华人文化程度高于以往移民,尤以来自大陆的移民最为突出。八十年代大陆移民多为家庭团聚移民,拥有学士及以上者仅占其总数的 5%,而到了九十年代,随着技术移民比例的大幅增加,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者也增至 36.8%,远远超过港、台移民 10.9% 和 22.4% 的相应比例。但在掌握加拿大官方语言方面,大陆移民整体外语水平要逊于港、台移民。

华人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二战后对他们歧视的减少使加拿大华人的职业有了明显的变化,往日“三多”(洗衣店、杂货店和餐馆)的传统行业取向被打破,华人开始涉足加国的各行各业。在二三十年代,受雇华人中约 2/3 的人为餐馆或洗衣房工人、仆役或干其他粗活,而 1991 年人口普查显示,这一比例已降至 18%;与此同时,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华人从当年不到 0.5%,增加到八九十年代的 18%-19%。华人在教育和就业方面的进步导致经济上的改观,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新的华人中产阶级已形成,主要从事专业技术和管理工作。他们中 80% 以上不是在加拿大本土出生,多数是在 1967 年之后移居加国。华人中产阶级还包括为数不少的港台商业移民,这些人凭借经济实力,来加后购置房地产,开办公司、商场,或办报馆等,将上百亿资金投入加拿大经济市场,同时为该国创造了众多的就业岗位。

三、华人新移民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目前,每年从世界各地移居加国的人超过 20 万。如上所述,华人新移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国内已取得高学位,来加主要是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然而,过去 20 年间,华人“回流”现象呈上升趋势。多伦多华人普通话协会 2002 年网上调查显示,华人新移民中仅 20% 的人表示在取得加拿大国籍后会继续留在加国。虽然中国政府近年来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吸引海外华人回国对移民“回流”有一定影响,但加拿大令人沮丧的经济现状是主要原因。加拿大 2009 年发布的“多元文化调查”

显示,华人移民中仅有 37% 的人认为加拿大生活质量高于国内,六成以上的人持否定态度。在就业方面,超过 70% 的人对加国就业状况不满意。

1、就业难、收入低。华人新移民,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来加的大陆技术移民,教育程度普遍较高,但其学历与在加获得的经济待遇不成正比。高失业率、工作不对口以及收入低是他们面临的严重问题。加拿大学者宗力 1997-1999 年间对多伦多等 6 个城市近 1200 名九十年代移居加国的大陆专业人士调查后发现,仅 31% 的人从事专业性工作,41.1% 的人从事社会地位相对低下的非专业性工作,另外还有 22.4% 的人从未工作过。加拿大 2001 年人口普查也显示,华人移民就业率低于加国总人口平均就业率近 20 个百分点。

另外,加拿大学者 Wang 和 Lo 的调查显示,华人移民年收入仅为加拿大人均年收入的一半。就华人移民内部而言,虽然来自越南的华人移民受教育程度不及大陆及港台移民,但收入却是这几个群体中最高的。Wang 和 Lo 认为,这与越南华人来加时间较早有关(多数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作为难民入境)。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移民的海外学习经历在加拿大不被承认。加拿大学者奥里普勒斯 2008 年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同时指出,加拿大就业市场种族歧视严重:那些来自英语国家并有加拿大学习经历的求职者获得的面见机会比同样拥有加拿大学习经历的非英语国家的人高出 40%,若后者仅有海外学习经历,则前者获得的面见机会比后者更是高出三倍多。

为了事业和生计,不少华人移民不得不去高校重新“镀金”,以获取加拿大证书或文凭。许多原先在国内属专业人士的高学历人才,如今却不得不去工厂打零工,开出租车,当店员等,他们常将这种尴尬境地笑称为“洋插队”。有些人因对前途悲观失望甚至走上了绝路,如大陆移民耿朝晖和蒋国兵等先后自杀身亡。也有不少移民则干脆选择“回流”,通常是男方回国工作,留下妻儿在加拿大等待公民身份。这种“太空飞人”式的家庭生活往往

给婚姻带来隐患,最终导致夫妻劳燕分飞的例子时有发生。

2、语言和文化障碍。华人移民,尤其是来自大陆的新移民,和其他移民群体相比,英语水平较低,尤其是口头表达能力差,难以和别人很好沟通。加拿大学者近年所作的一系列调查都显示,语言问题对华人新移民在求职、职位晋升、交友以及寻求社会和医疗服务方面都构成障碍。即使没有语言上的问题,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多数华人还是认为自己难以融入主流社会,普遍有一种被排斥感。除了在生意上以及工作场所和老外打些交道外,真正的朋友圈子还是中国人。

大陆新移民在社会融入方面困难更多,往往遭受双重语言障碍。除英语外,华人社区内部语言及文化差异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大陆新移民来加后往往发现这里的华人社区俨然是一个个“小香港”:无论是房地产开发商还是公司经理大多来自香港,他们招聘员工除要求懂英语外,还要懂粤语;中国城里,从商店招牌到街道路标以及餐馆菜单多为繁体字;就连几家主要的中文报刊,如《世界日报》、《明报》以及《星岛日报》,都由港台富商创办,使用繁体字印刷。报刊文章中还不时夹杂粤语和闽南话,这让从小讲惯普通话用惯简体字的大陆人难以适应。

在移民安置服务方面,大陆新移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与挑战。诸多调查显示,大陆新移民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困难时,往往只是向家人、朋友、甚至华人教会求助,却很少从政府的移民安置服务机构寻求帮助。这也多是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所致。在这些服务机构中,工作人员大多操英语或粤语,熟悉英美和港人的行事方式,对大陆新移民所提供的安居服务往往缺乏文化敏感性,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另外,近年来加国政府紧缩移民安置经费,致使一些服务项目无法实施或名存实亡,这也给新移民在加国的生活造成困难。■

(作者单位:安徽建工学院外语系)

责编:姚少宝